

斷裂與連續

評許維賢的《從豔史到性史》

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書名：《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

作者：許維賢

出版年：2015

出版社：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公司

許維賢的《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是一部男同性戀文化史。這部歷史並不僅僅陳列了中國男同性戀的相關文獻，更時時挑戰多種相關的陳腐概念¹——它頻頻發出不平之鳴，遠勝只堆疊資料卻缺乏立論的多種中外文書籍。我先抓出這部書的軸線之一，以便討論：斷裂（rupture）與連續（continuity）。且容我用口常生活譬喻說明這兩個詞：從一整盤披薩餅掰下一片披薩，這片披薩就脫離了整盤披薩；但是，這片披薩和整盤披薩之間存有「牽絲」的乳酪，所以它並未完全脫離整盤披薩。一片和整盤的關係既是斷裂的，也是連續的。

1 例如許挑戰魯迅。各國學人一談到中國文學的男同性戀，就習慣沿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對於男妓（相公）的看法。許在北京大學的教授陳平原早就指出，中國小說研究者都畢恭畢敬承襲《中國小說史略》，結果其研究格局和理論皆因而受限；許則進一步指出，魯迅書中的種種偏頗，如獨好某些文類卻輕忽其他文類、鄙夷同性戀愛，致使中國學界長期輕視同性戀文學（許維賢，2015: 37）。

上述的軸線分成兩部分：豔史和性史之間有牽絲嗎？同志書寫和男性建構之間也牽絲嗎？

這兩個斷裂／連續的課題，就寫在這部書的標題上。我將主標題「從豔史到性史」視為全書的主張，將副標題「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當作全書的「轄區」（研究範圍）。副標題中的「近現代中國」表明：此書的轄區就時間而言是整個二十世紀，兼及前後的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就地理而言是以北京為主的中國本土，並沒有用一種吃豆腐的方式把香港和台灣收編進去。《從豔史到性史》的轄區挑戰了各國學者的陋規。長久以來，研究者一談到中國的同性戀文本，目光就跳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框架：要不是將時間軸往前挪，瞄準二十世紀之前的舊中國男色傳統，就是將空間軸往外挪，收割香港、台灣的文化生產，彷彿港台的成果理所當然也算是中國的。時至 2010 年代，某些東西方學者逕自將邱妙津作品當作「中國文學」來詮釋；這種行徑背離了學術誠信，就像某些理工學者為了實驗順利而製造假數據。為了方便行事而在時間軸、空間軸上動手腳的做法，顯然迴避了「如何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境內同性戀」的課題，也同時暗示「二十世紀中國沒有同性戀可供研究」。但許維賢明確表示，正是因為中國學界、文壇漠視這個課題，所以他才偏偏要直接處理二十世紀中國同性戀文本。許維賢（2015: 75）發現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藝文界已經出現生機蓬勃的同志題材作品，例如台灣比較熟悉的崔子恩電影和小說，但中國學界對於這股同志發聲的潮流視若無睹，所以他也要為這批被忽視的創作者出一口氣。

說到這邊，我要指出《從豔史到性史》的主要貢獻之一：二十世紀中國境內生產的同性戀課題創作長期遭受各國學者有意無意遺忘，《從豔史到性史》挺身批判這種失憶症。

上一段說明了副標題中「近現代中國」這幾個字的微言大義。接下來我要說明「同志書寫」和「男性建構」這兩個容易被讀者誤解的用詞。在台灣學界，前者通常寫成「同志再現」或「同志文化生產」，後者則多作「男性氣概」或「陽剛氣質」。許維賢採用「同志書寫」，是因為他覺得「同志／同性戀文學」、「同志電影」等類別不夠開闊，無法容納各種形貌的文本，所以他偏好「酷兒文學」，² 更愛採用從法國學界出口的「書寫」一詞——他認為「同志書寫」這個詞具備法國理論界充沛的思辨活力（許維賢，2015: 31）。我從此例看見許維賢的一種傾向：他相信字詞、術語有高下之分，並持續努力尋找比較高明、比較「進步」的用字——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他認為「酷兒文學」比「同志文學」開放，「書寫」比「文學」或「電影」優越。許維賢「追求最對的詞」的傾向難免有爭議，例如他將同志電影視為同志書寫的一部分，但是「影像媒介」不該被視為「文字媒介」的附庸。³ 我覺得大可不必追求最對的詞，而不妨採用寬廣的「容器」，例如台灣慣用的「同志再現」，暗示文學、電影、俗民文化都再現了同志人事物，而「同志文化生產」則暗示文學、電影、次文化等文化產品都生產了同志形貌；兩者皆為輕鬆好用的容器，可以容納許維賢談論的種種文本。

副標題的「男性建構」四字也出於許維賢對於最佳用詞的執著：他認定現代性將 sex、gender、sexuality 網綁在一起（許維賢，2015:

2 許維賢（2015: 29）相信「酷兒文學」（queer literature）可以打破同性戀／異性戀二元之分。這是他個人對於酷兒的詮釋，未必類同其他學者對於酷兒的多元解讀。

3 長久以來，在包含台、美等許多國家的文學研究界，研究者出於「文學本位主義」的立場，將電影當成文學的旁支。這種文學本位主義早就廣受批評了。

19)，按照卡維波（甯應斌）的詮釋將 sexuality 翻譯成「社會性」（許維賢，2015: 7），並自行將 masculinity（也就是陽剛的 gender）翻譯成「男性建構」，藉此強調「男性氣概」其實是一種社會的建構（許維賢，2015: 38）。卡維波和許維賢對於某些「絕妙好詞」的執著恐怕會造成閱讀障礙：讀者可能看不懂，也可能被誤導，以為每個西方字都可以對應唯一正確的中文詞。我建議，既然《從豔史到性史》全書承認 homosexual 和 comrade 等字一進入不同脈絡就對應了不同的中文翻譯，那麼 sex、gender（masculinity）、sexuality 同樣也可以在各種脈絡變化成不同的中譯詞。卡維波說 sexuality 是「社會性」，強調 sexuality 的社會建構屬性；許維賢說 masculinity 是「男性建構」，強調 masculinity 的社會建構屬性；而我要說，被視為「生理性別」的 sex 其實也被許多女性主義者承認是一種社會建構，也是後天的而不盡然是先天的。到頭來，sex、gender、sexuality 這三者都是「社會性」、都是「建構」，難以區分；我建議乾脆承認這三者本來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需要對應多元、多變的中譯。

主標題的「從豔史到性史」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斷層：按照書中的描述，這個斷層出於 1920 年代，也就是中國文人開始熱烈地從西方翻譯、並師法西方討論「同性戀」人事物的時期。在此斷層之前，豔史當道：許維賢說，豔史是「一套通過中國古典豔情說部（例如小說、詩詞、筆記和類書等等集大成的『豔史』傳統），長年累月形成了一套中國性愛藝術的合法敘事機制」，跟中國的「正史」傳統相對（許維賢，2015: 9）。在斷層之後，「現代社會敘述人類各種性／別不馴（gender nonconformity）歷史的權力機制稱之為『性史』（許維賢，2015: 8）——從上下文來看，許維賢採用「性史」一詞，不但向傅柯《性史》致敬，也遙指許本人並不以為然的中國 1920 年代張競

生《性史》，以及二十世紀末中國書市開始大量出現、品質不一的種種性史。

我認為《從豔史到性史》的主要貢獻之二，就是坦然指陳同性戀在中國的斷層：曾經為各國同性戀者傾慕的「斷袖」、「餘桃」、「龍陽」等逸事，都是被現代性打斷、隔絕的舊傳統；今日的中國同性戀者及其國內外朋友，必須改而面對同性戀者被「機制」（敘事的權力機制，以及其他權力機制）操控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承認這個斷層，才能夠去除國際人士對中國同性戀者的「東方主義」目光，揭發中國人自己的「自我東方主義化」——不少國際人士和中國人都樂於召喚中國曾經是同性戀天堂的可疑神話。正如許維賢觀察，傅柯本人就是以東方主義的心態管窺古中國的性，中國坊間各種性史則以自我東方主義化的手段攻佔書市。

《從豔史到性史》的格局很容易讓人聯想桑梓蘭的《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Sang, 2003／王晴峰譯，2014: 110）。兩書同樣都以整個二十世紀為主要研究範圍。我認為二者的主要差別除了關注的群體不同（許書只談男同性戀，桑書只論女同性戀），還在於桑書傾向暗示「連續」，許書卻傾向指陳「斷裂」。例如桑書認為二十年代末期中國女作家寫的女女情慾召喚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作品，就連邱妙津的作品也呼應了中國五四，被列入兩岸三地大中華文化的陣營。也就是說，晚近中國女作家、台灣女作家都和五四女作家「連續」（連結、接續）在一起了，彷彿各方（如台灣和中國）之間的斷層可以略而不計。許維賢強調「斷裂」的傾向適時打斷一片歌頌「連續」的混聲合唱。「連續」和「斷裂」的信奉者剛好對應了不同的治學方法：「連續」的鼓吹者並不會投身「歷史化」、「脈絡化」的工作，因為這兩種吃力的工作會將研究者推往「斷裂」

的傾向。跟桑書相比，《從豔史到性史》的歷史化、脈絡化工作顯示了更具說服力、更細緻的多維式歷史畫面。

我猜想，許維賢可能覺得《從豔史到性史》這本書仍須「按部就班」、還是要先交代豔史的案例再進入性史的階段，所以導論之後的第一章就放在清末風流人物王韜的豔史上。王韜固然是晚近國際漢學界的熱門題目之一，但這章終究「耽誤」、「延遲」讀者進入《從豔史到性史》的重頭戲：也就是第二章敘述的「性史」。1920年代性史興起，豔史的霸權逐漸退隱。

第二章畢竟是歷史回顧，第三章的創意更有看頭，其軸線主要有二：一、1920年代郁達夫的男男情慾文本，與1990年代王小波（李銀河的丈夫）、崔子恩同志文本的比較；二、老同志和新同志之間的關係，前者即國民黨、共產黨所稱的「同志」，後者乃意味「同性戀」的「同志」。第一條線顯然旨在借用老牌作家郁達夫之名，來為被主流學界低估的王小波、崔子恩爭一口氣。第二條線所要談的關係，其實比字面上的意義更具野心：許維賢不只要指出老同志和新同志有交疊亦有互斥之處，還要指出老同志和新同志的曖昧關係展示了一種中國式的 masculinity，即許維賢採用的翻譯「男性建構」。言下之意，世界各國的 masculinity 各有不同樣貌，在中共領土的 masculinity 則是老同志與新同志互動的結果。對於許維賢的說法，我有兩點意見：一、本書的副標題「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就已經暗示了兩個群體：新同志（的文化表現），以及重視 masculinity 的老同志。既然老同志早就執迷於 masculinity，那麼老同志和新同志交手的 masculinity 又是哪種 masculinity？這些此起彼落的 masculinities 要如何釐清？二、許維賢想要嚴格鎖定研究範圍，所以只談男性而不談女性。但是這種自我設限很可惜。老同志和新同志的拉扯，當然也是中

國女同性戀的課題。這兩種同志跟 masculinity 的關係也跟女人有緣——近十年來，不論女同性戀與否，女人的 masculinity 也是國際學界的熱門課題。

第四章以中共建國元老、首席文人官僚郭沫若為例，指陳郭沫若私下的同性愛與公開的黨國愛（擴及郭對毛澤東的愛）之間的競爭。第五章回到各國學者熱衷討論的《霸王別姬》，包括小說版、電影版和梅蘭芳典故。第六章比較清朝《品花寶鑑》的典雅舊北京，與改編成電影《藍宇》的網路文學《北京故事》的暴發戶新北京。這幾章豐富討喜，但其後形同全書結論的「餘論」更是及時雨：評估了當今中國同志文學的危機與潛力。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持續撰寫台灣同志文學史的我當然受惠，得以同時比對中國同志史和台灣同志史的異同。兩邊的同志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1949 年之前，中國同志史由五四文人用「中文」開創，台灣同志史的史料則大致發表在島內「日文」報紙上；1949 年之後，中國直至世紀末期才受到港台和美國激勵，出產新一波本土同志文學與電影，而台灣同志從 1950 年代開始就受到美國文化持續不斷的導引與制約，時間早在白先勇動筆創作之前。中國和台灣的同志史是截然斷裂的，幾乎沒有連結、接續之處。但我樂見雙方對照閱讀，如此方可深切看見各自的強弱有無。

參考文獻

- 許維賢（2015）《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台北：遠流。
- Sang, T. D. (2003)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王晴峰譯（2014）《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作者簡介

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聯絡方式〉

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政大百年樓 4 樓 330414 室

Email: tw@nccu.edu.tw